

明钱穀《纪行图册》、张复《水程图》之大运河现地研究与 GIS 呈现(之一)^{*}

简锦松 廖泫铭 王 勇 张淑君
唐 宸 严 程 谢定紘

摘 要 钱穀《纪行图册》以王世贞隆庆四年(1570)六月《适晋纪行》为蓝本,绘成仓山小祇园至扬州扬子桥三十二幅;张复《水程图》因王世贞于万历二年(1574)二月入领太仆之役,附舟而北,绘成邵伯至通州水程五十二幅。两卷皆以写实为之,在明人画中堪称独绝。文章以现地研究法进行三项处理:一、此次王世贞北行,正在隆庆新河既成,淤河之议方生的明代大运河变动期,文章将二人所经过之水程全部数字化;二、钱穀自言“维欲记其目前真境”,文章利用明清旅行日记、方志、古今地图及笔者现地考察所得,将各图逐一解说,指出图面所绘内容,验证画者写真实践的程度;三、此八十余幅之价值,如同发现一大箱明代的拍摄影带,文章发挥其自身的影像本色,形象化地指出明代大运河的真正面目。

关键词 数字人文; 明代大运河; 现地研究; 钱穀《纪行图册》; 张复《水程图》

分类号 K928.6; J222.2/.6; TV91

作者简介 简锦松,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 廖泫铭,台湾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副技师; 王勇,东莞理工学院中文系讲师; 张淑君,上海大学硕士,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唐宸,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严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谢定紘,台湾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0 前言

0.1 关于《纪行图册》与《水程图》

纪行诗文,一向就不是古代文人写作的主流文类,即使像著名的范成大《吴船录》、陆游《入蜀记》,也被抽离他们的文集,另置别集;明代知名的杨士奇《北京纪行录》《南归纪行记》被放在《东里集》的《续集》^①;归有

* 该文分期连载,此为第一部分。——编者注

^① 见〔明〕杨士奇撰《东里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39册),续集卷48,《北京纪行录》;续集卷49-50,《南归纪行录》。

光的《壬戌纪行》，钱谦益编纂《归有光集》时，也借口往例，将之列入别集。^① 诗集中，往往把同一次旅程的诗篇，分散在古诗、律诗、绝句等不同的卷帙中，如元王恽《秋涧集》的福建往返诗篇便是^②。至于专门以纪行为卷名，如谢肇淛《小草斋续集》之《邮纪七十七首》^③、陈万策《近道斋诗集》之《乙酉划舟纪行》者^④，为数极少。诗文如此，古画益甚，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人钱穀（1508-1578）^⑤的《纪行图册》与张复（1546-1631）的《水程图》乃特别珍贵，院藏同为钱穀所作的《白岳游图册》，尚不能及。

对此二图册的前人研究现有六篇。第一篇是台港清华大学通识中心助理教授梅韵秋在 2014 年发表的《明代王世贞〈水程图〉与图画式纪行录的成立》，第二篇是台大历史研究所叶雅婷的硕士论文《王世贞的导览计划：〈纪行图册〉研究》（2017）。梅文对于明代运河及明清路程书、明代绘画史等方面的知识，具有优良的专业训练，因而谈论《水程图》的内缘和外缘问题时，虽有错误而瑕不掩瑜，特别是对《曲头集》《吕梁洪》《新闸河》三幅的讨论，颇见功力。叶文从钱穀和张复原图各自的版本入手考察，以“导览”观点来解释《纪行图册》和《水程图》的内容，最后并且讨论图中的作画技巧，取材深入，立论的观点也颇可取，近年她将硕论修改，在台北《故宫文物月刊》发表《明代的宦游文化——谈院藏〈水程图〉的纪实特色及其观众》。第三篇是香港中文大学蒋方亭的《王世贞的舟行宦旅——明代吴门画家〈运河纪行图〉册研究》（2017），乃其中国艺术史学门的博士论文，书中对王世贞本人及此次旅行的背景资料，作了深入的解说。对于两图，她以“《运河纪行图》册的面貌特征”“《运河纪行图》册的版本辨析”“形式来源：吴门画派与纪行图之兴”三章，从艺术史角度，做了很全面的处理，取得了良好成绩。第四篇是中国美术学院陈远的博士论文《王世贞的〈水程图〉与明代大运河之旅》（2019 年），分为两部分，前部从美术史谈《水程图》，后部从以“大运河之旅”为标题。陈君对于中西美术都很娴熟，数据丰富，文辞也很优美。第五篇是汤宇星的《风景的记忆与象征——钱穀〈纪行图〉与陆治〈临王履华山图〉考释》，汤君精于人物考释，议论十分精辟，对于钱穀《纪行图》本身未作太多讨论。第六篇是杜娟的《晚明画家张复的实境山水画》，也有精辟的见解。

本文拟由现地研究方法，直接面对每一幅图，具体指出钱张二人所画的内容是什么。全文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研究方法和对《纪行图册》与《水程图》的解说。第二步，是全部八十四幅原画的解说。此外，由于《水程图》是以王世贞居家的太仓为起点，笔者再以钱穀《白岳游图册》中的苏州至杭州的四幅作为补充，以使明代大运河的全程完整呈现，这四幅绘成于隆庆元年（1567），可以说是《纪行图册》的先驱。

① 见〔明〕归有光撰、周本淳点校《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卷首《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后附《编次之法》：“旧有行纪诸篇，今取陆放翁、范石湖例，入别集”（页 10）。

② 王恽的诗文集是分体排列的，因而同为至元二十六年己丑（1289）至二十七年庚寅（1290）往返于福建之行的诗篇，分散在五言古诗、七言长篇、五律、七律、七绝各卷，甚至同体裁的一卷之中，同时有南下与北归的诗篇，若非仔细分辨，往往滋生误会。例如《秋涧集》卷 4 为五言古诗，页 15 起，《舟宿桃源县》《食鲈鱼》《长至日次赤岸驿》《平望道中》都是南下的诗篇，但排序时，《平望道中》应在《食鲈鱼》（写于吴江县）之后，《长至日次赤岸驿》之前。接下来的一首《大安岭》仍是南下；但后面页 17、18 的《自淮口抵宿迁值风雨大作》与《吕梁》两篇，就是北归途中之诗。见〔元〕王恽撰《秋涧先生大全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收入《四部丛刊》正编第 66 册。

③ 〔明〕谢肇淛撰《小草斋续集》（日本内阁图书馆藏本，卷 3，页 4a-17a）收录其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十二月自江西信州至云南大理的纪行诗，一地一诗，共七十七首。谢肇淛的入滇诗并不止这七十七首，一直到卷 3 末的《别滇诗》以前，都是云南诗篇，而其中《庚申三月赍捧北上》诗（页 44b）以下，也有多首往返北京的纪行诗。

④ 见〔清〕陈万策撰《近道斋诗集》（济南：齐鲁书社，1996。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268 册），诗卷 1，页 122-136。他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随父亲陈廷鹤南返福建故里，六月出京，从六月初八日在河西务之日起，一直到九月二日至建宁府水吉镇，凡所经地名及月日，都在各个诗题里标出，最后并以“划舟纪行”名其小集。以诗集而有行记之效果，甚奇。

⑤ 按：刘鹏《钱穀卒年考》（《艺术工作》2019 年第 6 期，页 077-079），认为钱穀卒于万历十二年，应是 1508-1584。

0.2 关于明代大运河

笔者研究京杭大运河已多历年所,曾在2015年11月、2016年7月、2016年11月、2017年7月、2018年1月、2018年7月、2019年7月,七次到大运河全线进行学术考察。

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笔者以 Google Earth Pro 卫星地图为底本,将中研院所藏之清光绪至民国三十四年间绘制的历代大运河沿线所经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各省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形图、一万分之一及七千五百分之一城厢图,全部予以数字化,迭图于卫星地图中。然后将唐宋元明清文献中所取得的大运河沿线地名,全部输入 Google Earth Pro,取得正确的 GPS 地址。

大运河研究是目前的显学,各种古代文献材料已经被从传统的《四库全书》等丛书中访出,出版了许多套大型的大运河水利专书,不需要一一指明了。笔者除了从大运河水利专书中梳理河道,还经由下列六个数据体系,来建立河路,演算地名:(1)明清《实录》及治河奏疏;(2)唐宋元明清大运河相关行记及诗卷;(3)明清路程书;(4)明清方志;(5)清人手绘大运河图及相关图件;(6)当代电子地图,如百度地图、高德地图、谷歌地图及天地图。

这六大类数据中,明清《实录》及治河奏疏采用中研院“汉籍电子数据库”,方志使用“雕龙数据库”,都是现有的数据库。唐宋元明清大运河相关行记,作者包含中、韩、日本等国人士,是多年由笔者收集、标点精注的,共有112种,其他纪行诗作不计在内。明清官私路程书在手边的有三十种,主要采用《一统路程图记》《同行备览》的沿途详细地名^①;《山东运河图说》虽不归类在路程书中,其书的地名甚为详备,也列入采集。近年世界各大图书馆释出许多清人手绘大运河图及相关图件,也是本文的重要参考。

经由前述工作,笔者已经针对唐、宋、元、明、清的大运河历次变化,建立了路线及地名的数据库。近年,本来想把明代永乐修复大运河至现代京杭大运河重建工作间的六大变迁,作为主题,撰写一篇论文,但考虑到河道叙述,单调无趣,大运河里程既多,历时又久,变化复杂,文章不得不写长,不利于读者阅览。这次应台北故宫博物院之命解析《纪行图册》和《水程图》,两套画册都以写实之笔,画出了明代大运河的丰富形象,经由他们两人的眼睛,看见他们所经过的河道,事实上就等于解说了明代嘉靖四十五年新开河完成之后,到万历三十三年泇河新道浚成开始通漕之前的京杭大运河^②,这样的价值,比直接论说大运河的变迁更大。

笔者的处理方法是,每一段行程之前,以 Excel 表格,将沿岸地名全部标记 GPS 地址,两站之间全部标记实测公里数,并设置一栏记录累计公里数,将杭州得胜坝设为起点0公里,一直计算到张家湾1785.893公里为止,不中断。本文的里程表,没有设定填写明清里数的字段,是因为路程书、明清史、方志、水利书往往各有记载或互相抄袭,所目标里数甚多歧异,徒增纷扰,不如以实测为便。不过,古代地名传到现代,必然有很多变量,很多时候必须以拟测来作代表;实测公里数也一样,所有的计数都是以河道的中央线来量测的,但是,被计算的地名点是在河岸上,只能就近指定位置去运算。而且河道的依据来源,一是 Google Earth Pro 卫星地图,一

^① 关于明清路程书,笔者在拙撰《明清时期福州至杭州官私二路之交通路线与GIS呈现》一文已有解说,见清华大学、中华书局主编《数字人文》2021年第4号,页115-180(北京:中华书局,2022)。

^② 谈迁对于泇河工程的叙述颇为简要,转录于此,见[清]谈迁撰、汪北平校点《北游录·纪程》(北京:中华书局,1960,页25):“丁丑(08-14,1653/10/5,2325084)盖泇河始万历壬辰(二十年,1592),尚书舒应龙开韩庄,(自注:淮安城西北四十里,韩信始生处);己亥(二十七年,1599),尚书刘东星凿良城(自注:邳州城北六十里);癸卯(三十一年,1603),李化龙竣工,通二百四十余里,今人不复知旧河矣。”不过,李化龙实际浚成是在万历三十二年冬天,试行通漕是在三十三年正月。据《明实录·世宗实录》万历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李化龙上疏文(卷406,页7582-7583)可知。

是清末至民国早年的二万五千分之一、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卫星地图是近年现况,会受到大小水利工程、截弯取直、开新填故等因素影响。早期地图的问题,在于前人测量技术参差不齐,未必完全可信据。因此种种,使得误差难以避免。所以,使用本表的数据时必须同意下面这一点:“本表所作的 GPS 定位与公里数实测,都是经过缜密研究,已经尽量接近真实,并不等于真实;所有数据都非常具有实用功能,但并不是绝对值。”另外,我也将《水程图》的全部河道,经由 GIS 地图程序,与本论文同时发布在“明清水陆路程与文学”平台(MQRLGIS),向大众开放,网址为 <https://see.org.tw/mqrl>。

1 《纪行图册》与《水程图》的完成及本文研究方法

1.1 《纪行图册》与《水程图》的完成

由于《纪行图册》有钱穀本人所书跋语,《水程图》也有王世贞两次题跋,十分清楚,今分论如下。钱穀所画何以称为《纪行图册》,据《故画 001226 明钱穀张复合画水程图》所载钱穀云:

右画册自小祇园以至维扬郡共三十二番,赠送太仆王凤洲先生还天府作也。凤洲此册留予所三四年,未曾注意,今迫于行,勉尔执笔,维欲记其江城山市,村桥野店,舟车行旅,川涂险易,目前真境,工拙妍嗤则不暇计也,观者请略之。时万历二年岁次甲戌上元日甲戌[一月十五日,1574/2/6,儒略日 2295998],彭城钱穀识于悬磬室之北斋。^①

“太仆王凤洲先生还天府”,指王世贞在万历二年(1574)北上赴太仆卿之任,画册完成时间是上元日,正在出发前半个月左右。须注意者,“凤洲此册留予所三四年,未曾注意,今迫于行,勉尔执笔”这句话,由万历二年逆推三、四年,正是隆庆四年(1570)王世贞出任山西按察使之时,可见王世贞委托钱穀所画的图册,是指那次往山西赴任的旅程。王氏自撰的旅行日记称为《适晋纪行》,钱穀自然也称《纪行图册》,并无其他用意,过多的猜测,都属臆说。王世贞《适晋纪行》在六月二十七日日记云:

二十七日[六月二十七日,1570/7/29,2294710],黎明与诸友别,出京口,便风扬帆,抵瓜洲,日始出,大约如昨,而云物光彩半之。遂登陆。亭午至仪真县。^②

可见他从京口渡江抵瓜洲之后,在扬子桥进入仪征运河西行。正因为钱穀《纪行图册》是对应王世贞《适晋纪行》而作的,所以他的结束点第三十二幅所画的就是扬子桥,对于扬州只是模糊带过。张图是继承钱图的,以全卷对苏州、淮安、徐州、临清、德州都作详图的体例而言,他不作扬州图,当然是尊重老师的缘故。

《水程图》共八十四帧皆张复所作,其中前三十二帧是以钱穀《纪行图册》为师法的模仿之作,后五十二幅才是他自己创作的新航程。《水程图》的原图册上,有两段王世贞亲笔所写的跋语,内容如下:

(一)吾家太仓去神都为水道三千七百里,去年春二月入领太仆,友人钱叔宝以绘事妙天下,为余图自吾家小祇园而起至广陵,得三十一幅[集作三十二帧]。叔宝上足曰张复,附余舟而北,所至属图之,为五

^① 本跋之末有“叔宝”及“悬磬室”二印,与《明钱穀纪行图册(故画 001140)》图册三十二帧相同,应移置于此册。又,本文于行记日期,皆记载中国历、公历及儒略日(Julian Day),下同。

^② 见[明]王世贞撰《弇州四部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 1281 册),卷 78,《适晋纪行》页 1a:“隆庆己巳[三年,1569]冬,余迁山西按察使,其明年之二月,乞放归田里,不许,至六月,期限已逾,会老母病良已,始决策治行。”

十帧,以贻叔宝,稍于晴晦旦暮之间加色泽,或为理其映带轻重而已。万历乙亥〔三年,1575〕春日,世贞题于郟阳使院。

(二)张生所图故缺通州、张湾二帧,今春过余山斋中,漫为补之,然春明门外天涯,久矣无眼光落此径也,丁丑〔五年,1577〕春日又题。

此次入京行程,张复全部在大运河船上,古人称舟行为“水程”^①,因而其把自己所绘图标题为《水程图》,理所当然,不需另生枝义。王世贞所谓“吾家太仓,去神都为水道三千七百里”,实测为太仓县至苏州阊门 50.724 公里,苏州阊门至通州 1628.279 公里,合计 1679.003 公里。明代道里规定以周尺计算,一里为 0.44496 公里,换算为 3773.38 里,可谓近同。除了此点真实外,王世贞的语气明显偏重钱穀,此文所言的未可全信。

张复随王世贞入京后,寄寓在其弟世懋宅中,客居多暇,应该很快完成了图册。可是王世贞第一次作跋是在万历三年,距离入京水程已及一年。这一年的延宕,应是王世贞把张复所画的五十帧寄给钱穀(即“以贻叔宝”),请他“稍于晴晦旦暮之间加色泽或为理其映带轻重”而造成的。张复所画的八十四帧中,除了最后的《张家湾》及《通州》外,其他八十二帧皆由钱穀用印而非张复,很明显这是王世贞的意思,他想把二十九岁青年学生的作品,挂名到六十七岁成名画师的名下,以增其价。台北故宫博物院将本卷标为“明钱穀张复合画水程图”,亦缘此而误。其实以画而论,张复自画之图的内容,都是基于眼前真实而作的,钱穀未至其地,所能够修改润色之处极为有限。而且,钱穀在自作的《纪行图册》中每幅都用了“钱氏叔宝”“悬磬室”一至二印,在《水程图》只用“钱穀”印,可见他无意侵占,用印亲疏区别,非常分明。张复对于自己的画作只由其师具名没有本人的私印,等于是画本易主,虽然不满,却难明言,所以私下保留两张,使原卷残缺,两年后才拿出来时上面盖了“张氏元春”“元春”“复”三个印,宣示主权的意思非常明白。

此外,“所至属图之”五字也长期被过度解读,认为是王世贞以自己的意志随处指示张复作画,连当时在北京见过张复的孙矿都有此误会^②,其实从王世贞本人的行程,就可以证明绝无此事。何以证明《水程图》内容是出于张复自己的判断,王世贞并没有全程指示张复作画呢?理由很简单,张复虽然是附载于王世贞的官船北上,但王世贞在徐州就下船改为陆行了,此后便不在现场。据王世贞《徐子与》第十七书所云:

仆自北行数日后,病良已,抵彭城而苦水阻,改道从陆,以三月望后入都门,去国十九年,人人见讶容鬢,以为真苏中郎北归日状。^③

此封书信的前一封,写到自己在隆庆五年(1571)作了《哭于鳞百廿韵》诗及奠章^④,后一封第十八书谈汪道昆事,汪道昆被罢职在万历三年(1575)六月,信中有“今已五十,前路足可知,遂初之后,事事胜作宦”,万历三年正是王世贞五十岁时。第十七书夹在中间,知为万历二年事也。而且使用“苏中郎北归日”“去国十九年”的

① [明]庄元臣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自京回苏州,其航行日记就称为《水程日记》。其他称水程者,如[元]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四部丛刊》三编子部)中“浙行省建治所于杭,陆路赴都三千九百二十四里,若水程则四千四百四十里”(卷17,页16b)之类,不胜枚举。

② 见[明]孙矿撰《书画跋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816册),卷3页,33b-34a,《跋钱叔宝纪行图》:“张元春即寓敬美家,余时见之,美少年也。渠所至为图,司寇公当有指授,得叔宝稍润色之,应更佳耳。身曾亲历以入画,自有深味。”所云“司寇公当有指授”,乃顺着王氏原跋而作臆测之词,同时也因为张复太年轻之故。

③ 见《弇州四部稿》,卷118,页16a。

④ 见《弇州四部稿》,卷32,页13a-16b,《哭于鳞百廿韵》。按:李攀龙卒于1570年。据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之《祭李于鳞文》(卷105,页2b-4b),此诗作于隆庆五年(1571)三月壬戌朔。奠章,即《祭李于鳞文》。

典故,也明确指万历二年再度入京。^①换言之,这封信的人、事、时、地皆无可疑,那么,王世贞从太仓到徐州经由水路,自徐州至北京则由陆路,是可以确定的,并非全程皆由水路。

徐州入京道路,水陆完全不同,陆路自徐州北行出安国驿,走滕、薛、邹、峰之郊,经东平、茌平、高唐、平原;水路东出境山、夹沟,经济宁、东昌、临清,至德州两路始会(图1),随即又分,水路走桑园梁店驿,抵张家湾至京入崇文门,陆路走留智庙经景州河间,由卢沟桥至京入阜成门。张复在与王世贞分道之后,仍然由水路进京。《水程图》全部为水程,其原因也很清楚,因为王世贞北上时还带着家眷^②,家眷不便陆行,所以虽然苦于水阻,仍只能等候水路修复,乃委托张复照顾人员,保护行李,由水道缓缓而来。

换言之,王世贞只在昆山至徐州这一段水程(660.874公里),与张复同在舟中,此后从徐州至通州(水路1018.129公里),水陆分别,并不同行,自然不能“所隶属图之”。



图1 徐州至德州间大运河的水陆二路(蓝色为水站,红色为陆站)

王世贞舍舟就陆的原因,据其寄许殿卿书信所言,乃为程限所急:

仆有此除,乃当事者以雕虫拔我,念时清恐负知己,染指一出,家园山水风物,事事碍人,行年五十,刺促不已,欲何为耶?于鳞没,遂四改岁,墓草已宿,言之腐心。兹行深拟枉道一奠,因得奉足下及殷相公杖

^① 苏中郎即苏武,“去国十九年”乃用苏武典故,并非实数。王世贞在本次入京之后,并未再至,故决然可当万历二年入京之事。

^② 王世贞携眷入京的证据,就是同年他离京赴任郟阳时,作《承德郎广西太平府通判王君墓志铭》(《弇州四部稿·续稿》,卷103,页12a)所云:“当甲戌之冬仲,余以家返仪真,别而西治郟。”王世贞北上时携带家眷,离京时也携之而南,到了扬子桥,他自己西入仪真赴任,家眷经由瓜洲南归。

履,而简书颇迫,事体有极揆眼耳者,强自抑耳。兹走信归于鳞,梓其家,致束刍之奠,并相闻足下,异日解绶乘款段而南,不妨白雪楼信宿也。^①

李攀龙卒于1570年,文中“于鳞没,遂四改岁”,可见这封信作于万历二年。信中有两个关键之语。第一,王世贞提到“兹行深拟枉道一奠李攀龙”,可证明当时他已经从徐州陆路北上。大凡书信中对人言语,必定具备双方共同认知的真实性,假如王世贞这一段仍从水路而行,便没有绕道往济南的可行性;如果在无可行性的情况下他还告诉许殿卿,自己本来想绕道济南奠祭李于鳞并拜访你们,岂非欺人?书信中不会这样做的。王世贞会写出自己本来想绕道济南,就是因为他已经从徐州登陆,现在已经往往平而来,在平是距离济南最接近的城市。正常北上入京时,在平驿的下一站是高唐驿,距离35公里,一日可达;如果枉道至济南,那么,在平离开济南有86公里,在济南奠祭之后,到高唐县92公里,合计要四五天才可以回到高唐驿。换言之,如果王世贞不枉道,只需要一天,如果枉道一奠李攀龙,需要五天。五天并不长,所以是可能的,既然有绕路到济南的可能性,王世贞才会告诉受信人他有这个打算。因而可确定作此书时,他已经陆行在道了。

第二,自“简书颇迫,事体有极揆眼耳者”一语观之,王世贞确实遇到限时入京的问题,明朝的法制极严,官员就任或办差,都会给予期限,“简书颇迫”四字指此。“事体有极揆眼耳者”,“揆眼”是王世贞常用语,指不忍看之意,可能是风闻如果不能在程限内抵京,有人将针对他而借题挑起事端。

本来,王世贞从大运河舟行,在航路正常时,原可在程限内抵京,然而不幸遇到水情不稳,运道中阻,无法估计会滞留几日,因而轻车简从,先以马轿北上。

1.2 《纪行图册》和《水程图》作画方法

不论是《纪行图册》还是《水程图》,钱、张的作画目的与画风方法,都与早先或同时的名家不同。以最接近写实的上海博物馆藏沈周《两江名胜图册》比较,这一组十幅图,计含淮安、高邮、扬州、扬子江、茅山、石湖范公祠、昆山城、吴江垂虹桥、杭州岳坟、杭州等地,所画已经力求真实了,但仍太着力于“画”的精工,而牺牲了现地的真实。《两江名胜图册》最写实的是《扬州图》,图中将扬州钞关前运河道两次九十度转折,如实铺陈,还把挹江门及钞关前浮桥、缺口门及门外浮桥,都依照比例画于应在的位置。其次是《淮安图》,图中央突出了淮安城西门和漂母祠、皇华亭,以《水程图》相比的话,漂母祠所在的位置及造形,几乎相同;而皇华亭则不得不推举《两江名胜图册》更胜于《水程图》,它非常具体而真实地画出了皇华亭以及临水码头的形象。《吴江图》对垂虹桥、桥心亭子及宝塔都画得很清楚,但作者在桥的南面直接画了太湖和太湖七十二峰,与现地方位及景观绝不相符;《昆山县图》画出城中马鞍山,固然确有此山,但马鞍山高处不过七十余米,山麓宽平,图中的山形被美化得太过度;《高邮图》画出南门琵琶关河道及城门、定国寺及塔、隔运河以西的鹭社湖及西空残月,但是,定国寺及塔在城内^②,沈周的图中却置于城外,今塔古迹只有七层,画中至少十一层。其他各幅的写实程度更低,无需讨论。综而观之,可以说,沈周已经为明代吴门画风开启了纪行和写实的道路,但是他走得并不彻底,有时不免为了艺术美感,而牺牲写实性。

^① 见《弇州四部稿》,卷122,页2b-3a,《许殿卿》第三封。

^② 见淮扬徐海四属剖面测量局测绘之《高邮县城厢图》,民国十一年(1922)七月制印。比例尺七千五百分一缩尺。定国寺今改名镇国寺,因大运河拆城墙改道,现在重建镇国寺在大运河东岸,定国塔古迹在其旁(北纬32°46'31.92",东经119°25'33.75")。

与《纪行图册》的作画方式直接有关的,是同为钱穀所画的《白岳游图册》(又作白岳)。《白岳游图册》凡十八幅,制于隆庆元年(1567)仲夏,比《纪行图册》早了七年,据其友人许初于隆庆三年(1569)在其画册上的题记云“罄室子在嘉靖丁未〔二十六年,1547〕为兹游,丙寅〔四十六年,1566〕乃想象作此。始吴门,道浙江,入睦州,泝歙溪,至白岳而止,图凡十有八纸”,钱穀是亲自旅行采景之后,酝酿了二十年,又画了超过半年以上,才完成画作。

《白岳游图册》的第一简《葑门图》就展现了强大的写实性^①,读者如果站在苏州城的东南角,向正南转西的连续方向注目,就可以看到和钱穀相同的景观,图中的苏州护城河、灭渡桥、复成桥,以及前方的袁家浜河、通仙桥,都很真实。运河岸上有驿路(纤道),通仙桥便是纤路桥,南下到宝带桥,都是纤道桥。至于图上远方石湖西岸的上方山及后端的天平山,方位虽有微差,山形也画得太高大,仍未化旧习。

从《白岳游图册》全体来看,钱穀虽然努力表现出写实性,也在许多幅图上题注了地点和特征,但写实程度仍不充分,如《宝带桥图》将澹台湖画得太大,桥中央太偏,山也太逼近。《垂虹桥图》的画法,不论是方向取角,或是桥身与祠、亭、城、塔的形貌,或是远程山峰,都与沈周《两江名胜图册》的《吴江图》相似,两图的画面排列也同样采取“左东右西,上南下北”的方位。

从现地残留的垂虹桥遗物可知,垂虹桥呈西北—东南走向,角度为 299 度,天气良好时,在桥上可能看见的山岭,一在西北方,即石湖西畔的吴山、寿子山、七子山、凤凰山、尧峰山等山,七子山最高约 284 米,如果以桥中的垂虹亭为立足点,位在其西北 309 度,距离 12.5 公里;一在西南方,即所谓太湖七十二峰,当然,七十二峰只有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可能被清楚看见,洞庭西山在垂虹亭的西南方,约 260 度,距离约 36 公里。换言之,登上垂虹桥的客人,必须向西北或西南眺望,才能见山。从沈、钱两家《吴江图》指定的视角,自桥上向南望,是完全看不到山的,何况山也画得太高太多了,纯粹为了画境之美而忽略了真实。

笔者在这里没有谈到元人冷谦《白岳图》和传说的明陆治《白岳纪游图册》,因为冷谦图与钱穀不相干,而陆治呢,笔者认为他并没有画作《白岳纪游图册》,世间的传本是单纯的仿真钱穀而挂名陆治的仿作。^②

历经《白岳游图册》的经验,笔者认为钱穀已经有走上写实画风的决心,正如他在《纪行图册》上的宣示:

勉尔执笔,维欲记其江城山市,村桥野店,舟车行旅,川涂险易,目前真境,工拙妍媸,则不暇计也,观者请略之。

《纪行图册》三十二幅都可以证明他所言并非空话。这样的认知,也直接传给张复,张复继之而作的《水程图》也采取相同的画法。本文将以现地研究法,将《纪行图册》和《水程图》逐一解说,以明其言之不虚。

一般认为钱穀生于 1508 年,张复生于 1546 年,到万历二年(1574),张复才二十九岁。作为钱穀的年轻弟子,他在一月中旬拿到老师的三十二幅画之后,半个月內立即临摹了一遍,并且根据他对各地实况的认知,作了极小幅度的修改,以后入京全程的创作中,他都秉承钱穀的写实画风,甚至有青出于蓝的表现。

① 标题为《葑门》,其实在葑门南,图中的灭渡桥距离葑门 1220 米。

② 日本藤井有邻馆藏有〔明〕陆治《白岳纪游图册》,笔者认为并非陆治所作。陆治(1496-1576)和钱穀(1508-1578)两人的年代相同,同样有《白岳游图册》,画作内容几乎完全一样,题词也完全一样,必有一册作伪。陆图《石桥岩》幅有“嘉靖甲寅(三十三年,1554)包山陆治记”,陆图也同样在《石桥岩》幅写下“隆庆改元(1567)仲夏,彭城钱穀制”,陆氏作“记”,并未说画出其手,钱氏作“制”明确说是自己作画,应以钱氏为是。按:《红豆树馆书画记》之《陆叔平梨花山鹤鹑》条作“包山陆治制”(卷 6,页 57b);又,〔清〕端木方撰《壬寅销夏录》(稿本)之《陆包山品琴图卷》(卷 8,无页次),亦作“包山陆治制”,此皆为作画称“制”之例。〔清〕陆时化撰《吴越所见书画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卷 4,页 81b)全录此十八条文字,称为《钱叔宝白岳游册》,至于陆治同名之画册,未见各家著录。

最后,请读者留意一件事,就是钱穀《纪行图册》与张复《水程图》都有多件次序排列错误的情形,笔者已经全数为他们校正重排了,并将原来排序错误以脚注插入,供读者比对。请依本文的正确排序:

《纪行图册》: 1 小祇园 2 太仓 3 甯子铺 4 新洋港^① 5 昆山 6 真义 7 维亭 8 沙湖 9 下雒渚 10 娄门 11 金阊 12 枫桥 13 射渚 14 浒墅 15 望亭 16 梁溪 17 惠山或慧山 18 洛社 19 横林 20 白家桥 21 毘陵 22 新阊 23 奔牛 24 吕城 25 丹阳 26 黄泥坝夹冈^② 27 新丰 28 丹徒或丹徒镇 29 金焦或金山 30 京口或镇江 31 瓜洲 32 扬子桥

《水楼图》: 1 邵伯 2 露筋庙 3 高邮 4 宝应 5 淮安漂母祠 6 移风闸 7 清江浦闸 8 淮河口 9 清河县^③ 10 桃源 11 古城 12 白洋河 13 宿迁 14 直河口 15 邳州 16 曲头集 1-17 吕梁洪 18 徐州 19 茶城^④ 20 镜山 21 夹沟驿 22 夏镇 23 新阊河 24 河桥^④ 25 济宁 26 南旺 27 安山闸 28 张秋 29 东昌 30 临清 31 武城 32 甲马营驿 33 郑家口 34 梁家庄驿 35 德州 36 梁店驿^⑤ 37 连窝驿 38 新桥驿^⑥ 39 砖河驿 40 沧州 41 千宁驿 42 清县即青县 43 流河驿 44 杨柳青 45 杨青驿 46 丁字沽 47 杨村驿 48 河西务 49 和合驿 50 湾口李二寺 51 张家湾 52 通州

2 研究方法

本文的目的有二,第一,直接解读《纪行图册》和《水程图》的八十四幅图,以及从《白岳游图册》补入的四幅;第二,定位明代嘉靖四十五年新开河完成之后到万历三十三年泇河新道浚成之前的京杭大运河。

2.1 对八十八幅图的处理

《纪行图册》和《水程图》对于明代大运河研究者而言,它不只是中国美术史的名品,而且是新式的现地考察影像。钱穀和张复开创的不是绘画,他们所使用的技法,以现代观念来说,就是短幅用照片、大幅用录像,留给我们明代现况的写真集。这些图片的出现,已经改变了大运河研究的集体未来。用通俗的话来说,过去研究者偶然看到古画,很少人认为他们所画的内容会是真的,但是,现在钱穀和张复拿出了和照相机、录像机,甚至是空拍机来,拍出和真实一样的画面,研究者必须也拿出全副新的方法,才能解读它。

笔者的工作,就是找出钱穀和张复在画什么。用尽一切方法,审阅大量的诗、文、史籍、方志、图卷,数化大批旧式与新式测绘方法的地图、结合 GPS 与卫星地图,有时候还要把天文程序拿出来用,有时还会把他们的原图颠倒旋转来看,再加上七次现地研究的笔记与照片影像,尽可能去解读它。主要的步骤如下。

第一,首先辨识地名。《纪行图册》与《水程图》的地名,基本上都在笔者的大运河卫星地图平台上建文件了,并不难取得;也有少数,如“直河口”和“茶城”,向来被视为难题,“曲头集”记载更少,极难辨识。找寻定位

① 钱穀原序列为“甯子铺—新洋港”;张复原序列为“新洋港—甯子铺”。

② 钱穀原序列为“丹阳—黄泥坝—丹徒—新丰—金焦—京口—瓜洲”;张复原序列为“丹阳—新丰—丹徒镇—夹冈—镇江—金山—瓜洲”。

③ 张复原序列为“清河县—淮河口”。

④ 张复原序列为“夏镇—新阊河—济宁—南旺—河桥”。

⑤ 张复原序列为“东昌—梁店驿—临清”。

⑥ 张复原序列为“连窝驿—砖河驿—新桥驿—沧州”。

的方法,一般是先从方志、水利书、治水奏折中取得相关的数据,然后在笔者已经建立大量档案的明清大运河卫星地图平台上,结合五万分之一与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形图、一万分之一以下的城厢图,再参考明清人手绘的运河图,从河川、道路、府县界、距离远近、地貌特征等多方进行比对分析。

第二,确立画者的观景立足点。写实的画作,就像一张照片或一段影片,都有拍摄者的立足点,找到这个点,和画家从相同角度去看画作的内容,便能了解得更多。《纪行图册》与《水程图》大部分是从单一立足点向单一方向取景,如《南旺》《李二寺》等皆是,但有时也采用摄影手法的巡航式连续取景,如《高邮》《济宁》便是。

第三,确立画作的方位设定。一般我们看地图的习惯是,北方在图的上方,南方在图的下方,地图也都附有指北针。由于这个习惯,我们常常认为画作的上方为北,事实上也是这样,《纪行图册》与《水程图》中大多数的页面,都以北为上方(同理,运河为南北向时,以东为上方)。不过,像《桃源》《清江浦闸》《洋河》《天津杨青驿》等多幅,都是反过来,南在上方;其他还有许多幅的方位,倾斜度很大,也没有什么规则可言。

第四,解说图中物体的名称。画中的物体,主要是城墙城门、驿站、公署、寺庙、桥梁、舟船、关口、烟墩、闸坝、山、河,等等。除了原图上已经标记了名称的建筑物之外,笔者利用方志的记载,并利用大量的行纪、诗篇之所见,找出主要河川的流向,以及大小支流的名称,乃至山岭的名称与方位距离,然后对特定建筑的名称、城镇民居形貌,尽可能加以标记。在必要时,也利用了天文程序“Stellarium”,查取泊舟当时落日的时间、方位、仰角,来与图面印证。

第五,指出特殊事件。《纪行图册》和《水程图》是随地记录实况的,因而可以发现许多有价值的现象,例如:《沙湖》与《宝应》都对运河与湖水的关系做了处理;《下雒渚》画出帆船倒桅的实例;《清江浦闸》画出船只过闸的现况;《夹沟驿》只以简单的几笔,指出了晚明开新河转入微山湖的方向。最为重要的是,钱穀在《得胜坝》画出了此坝的具体形貌,完全超出吾人的想象;张复指出北运河到了沙孤堆之后,主河道并非继续从今天的白河北上通州,而是由湾口经李二寺抵张家湾,他并特别画出张家湾拥有大型泊船塘澳。

以上,简单列举了五点作为方法的代表,实际上,研究工作十分繁难,读者阅读全文,便可知。

2.2 对大运河的处理

本文处理大运河的方法,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在逐图解析时,随机指出。钱穀与张复航行的时间是万历二年,图中也有很多地方反映了当时运河的状况,例如《梁溪》图,本来大运河是从直河穿城而过的,时人也称此河为运河,画中因而把直河所在的南门望湖门放在重要的位置,但他们的船只实际已经走西环城河了,所以又突显了梁溪河上的西定桥。《昆陵》图,南门外的舫舟亭新修河道还没有动工,运河船仍走城内,所以图中未画新建的东水关,而是直接画到东门口。在徐州北,他画了《夹沟驿》,只画了漕河向微山湖方向折曲,下一幅《夏镇》及《新闸河》便是嘉靖四十五年完成的新开河。王世贞在徐州发现“抵彭城而苦水阻,改道从陆”,可能是徐州到夹沟驿之间有问题。类似上述这些大运河的状况,都在各图中随文解说。

第二种是将大运河全程的地名及航线,放在八十八幅解说的分程章节之前,以 Excel 表格发表,并经由 GIS 平台公开。这次公开的仅仅是明代嘉靖四十五年新开河完成之后到万历三十三年泇河新道浚成之前的京杭大运河,不涉及泇河与中河。而且,因为是配合钱穀及张复的作画内容,表中和 GIS 平台上都只呈现他们两人所作画的地名及路线。至于定位过程的细节,不能详尽说明,以下仅略述一二。

笔者在绘制运河线时,考虑到 1949 年以后对古运河大规模的拓宽河道与截弯取直,于是尽量利用光绪至

民国间的早期大比例尺地图加以复原。成效最大的是高邮段运河,现代高邮段运河被以拆城与新挖河的手段,完全改变了古运河路线,笔者依据日本东亚同文会的调查报告,以及民国十一年(1922)七月淮扬徐海四属平剖面测量局印制的七千五百万分之一《高邮县城厢图》,再加上对现地古河道残迹与建筑古迹亲自进行的GPS实测,精准修复了高邮古运道。在宿迁,也做了很成功的工作。但是,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够顺利取得成果。原因是早期地图的误差在郊外特别大,无法直接套用,例如在《淮河口》这一幅就用不上早期地图。至于会通河在张秋至临清间这一段,我们发现了大量被截弯取直的老河道,于是都以现地考察中所见到的老河道来取代今河了。这些部分都有很高的精准度,读者可以放心使用。当然,也还有一些遗憾,例如里运河西口到清河县旧县之间,徐州经茶城口到夹沟驿之间这两段,都仍有再研究的空间。

(未完待续)

An On-Site Study and Its GIS Presentation of the Grand Canal in *Painting Album of the Great Canal Journeys* by Qian Gu and *Visual Travelogue of A Journey Through the Waterways* by Zhang Fu of Ming Dynasty

Chien Chin-Sung Liao Hsiung-Ming Wang Yong Zhang Shujun
Tang Chen Yan Cheng Xie Dinghong

Abstract Qian Gu(钱穀)'s *Painting Album of the Great Canal Journeys*(《纪行图册》) was based on Wang Shizhen(王世贞)'s *Shi Jin Ji Xing*(《适晋纪行》) in the fourth year of the Longqing reign (1570) in June and was painted into 32 scenes from Cangshan Xiaozhi Garden(仓山小祇园) to Yangzhou Yangzi Bridge(扬州扬子桥). Zhang Fu(张复)'s *Visual Travelogue of A Journey Through the Waterways*(《水程图》) was drawn on the boat going north when Wang Shizhen entered the position of Taipu(太仆) in the second year of Wanli (1574) in February. He depicted 52 scenes from Shao Bo(邵伯) to Tongzhou(通州). Both works were done in a realistic style and are considered exceptional in the Ming dynasty's painting history. This article uses the on-site study method to undertake three tasks. First, since Wang Shizhen's trip to the north coincided with the Great Canal's changing period during the completion of the Longqing Xinhe(隆庆新河) 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Jiahe(汧河),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gitize all the waterways they passed through. Second, Qian Gu stated that he wanted to record the true landscape at that time, so this article uses travel diaries, local gazetteers, ancient and modern maps, and my own research results through the on-site study to explain each illustration and verify the degree of realism depicted by the painters. Third, the value of the more than 80 scenes is like discovering a large box of Ming dynasty videotapes. This article will reveal the true appearance of the Great Canal in the Ming dynasty in a visual and expressive manner through the true nature of the scenes.

Key words digital humanities; The Great Canal of the Ming dynasty; Qian Gu's *Painting Album of the Great Canal Journeys*; Zhang Fu's *Visual Travelogue of A Journey Through the Waterways*